

# 北魏内河航运的真相

岳东

(华清池文管所 文史室, 陕西 临潼 710600)

**摘要:** 学界一般认为北魏内河航运发达,但所引史料的阐释有预设性。实际上,北魏内河航运航程较短,航运的季节性突出,由于年久失修,水网被严重分割,且偏向于两淮前线。相比之下,北魏陆运发达畅通,全国主要干道汇集到都城洛阳,陆运网络的地位无与伦比。

**关键词:** 北魏; 内河; 水运; 陆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9)06-0027-04

史界对魏晋南北朝内河航运发达与否的认识存在分歧,刘汉东<sup>[1]</sup>、何德章<sup>[2]</sup>的结论较中肯,薛瑞泽<sup>[3]</sup>、马晓峰<sup>[4]</sup>则持发达说。张兴兆在对黄淮水运<sup>[5]</sup>、北方粮食水运及仓储<sup>[6]</sup>、河北内河航运<sup>[7]</sup>等的研究中持发达说,对黄河航运<sup>[8]</sup>的研究中却持中肯说。若寻出分歧原因,仍需重新对史料做全面梳理与准确研读,并结合当时社会情势对运输体系做全面考察,才能得到接近实情的判断。限于篇幅,以下仅就北魏期间情况略予研讨,以就正于方家。

## 一、北魏内河航运格局

### (一) 薄骨律镇至沃野镇的河运

北魏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已在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南<sup>①</sup>)与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间开发漕运。太平真君五年(444),刁雍任为薄骨律镇将,七年(446)上表:“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sup>[9]868</sup>刁雍虽开发了黄河上游水运,但此后未再闻,可知未成惯例。

### (二) 通往两淮前线的水运体系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四月,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曲赦徐、豫二州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sup>[9]177</sup>,是为供给江淮前线的水运的一部分,其由来即“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

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sup>[9]2858</sup>。邸阁是储存粮食等物资的巨仓<sup>[10]</sup>。泰常八年(422)到神䴥三年(430),经明元帝、太武帝两代征伐,夺取宋黄河以南司、兗、豫(今河南、山东)大部。宋泰始二年即北魏天安元年(466),宋将薛安都等内附,北魏又获淮北、淮西地<sup>[11]4124-4125</sup>,“徐扬内附”指此事(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扬州原宋豫州,北魏改名扬州,治今安徽寿县),设邸阁应在此年以后未久。八处津渡散布于黄河、漳水、济水、鸿沟与泗水等河渠枢纽处,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小平津位于黄河南岸,今孟津东北<sup>[12]</sup>。

其二,石门渡,位于今河南荥阳<sup>[13]</sup>。

其三,白马津,位于今河南滑县东北,又称黎阳津<sup>[12]</sup>。

其四,漳涯。王万盈认为漳涯在今河北曲周东北,即太行山东麓海河平原黑龙港流域<sup>[14]</sup>,应据《水经注·浊漳水》曲周故城旁衡漳故渎断定:“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旧有大梁横水,故有巨桥之称。”<sup>[15]144</sup>但该仓久弃,未见北魏沿用,即“昔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以赈殷之饥民。……许慎曰:钜鹿水之大桥也,今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状若丘墟,盖遗囤故窑处也”<sup>[15]144</sup>。漳涯之名应与漳水有关,但未必在曲周。民国《大名县志》载大名县第一区第十二乡有漳河涯村<sup>[16]136</sup>,据1990年大名县村庄调查,该县西魏庄乡行政村有西漳河涯、东漳河涯<sup>[17]83</sup>,分居古漳河两岸。“涯”,当地发音为yai,所以村名也称东、西漳河沿村<sup>[17]640</sup>。二村距唐宋大名

故城西南方向五六公里处，故城遗址夹隋代大运河两岸，正是现在的卫河处<sup>[18]</sup>。这样的河流、地形分布，及故址群的抵近选址，说明漳涯是大运河开凿前重要的水陆枢纽。

其五，黑水。王万盈认定黑水在今陕西华阴附近<sup>[14]</sup>，但北魏为支撑前线战事，在中原、华北腹地由西（小平）往东（济州）一线，依次置仓以备淮东，又选址陈郡、大梁以备淮西，岂容第一条序列排至华北时倒回关中？按此思路，笔者在大名、济州周围搜集，发现民国《元氏县志》载县第四区有黑水河村，距城五十里<sup>[19]58</sup>。黑水河（又称槐河、淮河<sup>[19]82</sup>）穿村流向东南<sup>[19]87</sup>，“黑水河村西、桂林寺南，有行车古路一条。东则即河作路，十二里至南佐镇。西从黑山岭过至太行山，二十里可通铁里门，至山西”<sup>[19]87</sup>。铁里门即元氏、井陉交界的韦箔岭<sup>[19]88</sup>。元氏县至今仍是交通枢纽，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107国道纵贯南北，青银高速公路呈西北、东南向过境，元氏、井陉间有县际公路。以上可推断北魏元氏的陆运枢纽地位。槐河出元氏境，东入葫芦河（又称大陆泽、广阿泽）<sup>[19]83</sup>北泊，即宁晋泊，往南为任县南泊，中联以澧河，故形似葫芦，系中原、渤海间黄河故道余水。由于地势低下，南来的漳河水系、滏阳河（至曲周与漳河合流），西来的赵州（今河北赵县）太行山麓河、溪，东南方向涌来的滹沱河南岸支流，都汇入大陆泽<sup>[20]</sup>。由元氏循黑水河—槐河—大陆泽—漳河—黄河—济水—泗水可水陆驳运至北魏南境，如泰始三年（467）正月，“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公私困竭，请发冀、相、济、兗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载，以赈新民；魏朝从之”<sup>[11]4131</sup>。冀州（在今河北衡水境）位于滹沱河流域，今滏阳河畔，与元氏隔宁晋东西相望，为此次运输起点，路线北段水陆驳运，南段于同年五月“清、泗方涸”<sup>[11]4137</sup>，也必接以陆运。总之，黑水处井陉东，系北魏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中原间交通枢纽，宜立邸阁。

其六，济州。北魏济州治碭磾（今山东茌平西南），位于古河南岸。津在城西<sup>[21]</sup>，太平真君六年（445），“魏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碭磾津”<sup>[11]3915</sup>，极重视该津。

其七，陈郡，北魏时治项县（今河南沈丘一带）；大梁，即北魏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后治浚仪县。鸿沟由今开封、陈留西到淮阳东分为两支，南支至沈丘入颍水，东支经亳县注淮水<sup>[22]</sup>。由黄河、荥泽、蒗荡渠、鸿沟、颍水与淮水构成的这片复杂水系，战国时贯通，魏晋时难行，东晋十六国汝、颍通航不如泗水<sup>[23]</sup>，北魏仍未见疏浚，仅部分河渠可航。

置八邸阁是北魏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大规模水运方案，它协调河、漳、济、颍、蔡与泗等水运、摆渡为一体，辅以陆运，供给两淮前线。但北魏黄河下游急湍，难以中长途航运，惟津渡可确保，小平、石门、白马津、碭磾为津渡，《述征记》曰：“碭磾，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sup>[15]69</sup>漳水、鸿沟常年缺乏疏浚，航运情况可知。泗水流域从南国夺得未久，虽可航运，但有季节性。整个华北水网是分割而不连贯的，津渡、短途航运占很大比重，陆运是必备补充。

### （三）汴、颍的运输

史界常引三例以证北魏汴、颍水运发达。例一，《魏书·薛野·附薛虎子传》载：“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sup>[9]997</sup>汴水、清水灌溉徐州良田与通航否无必然关系，而推断汴水航运发达者往往略去后句史料。例二，《魏书·鹿悆传》载：“尝诣徐州，马疫，附船而至大梁。”<sup>[9]1761</sup>时鹿悆为孝文帝弟彭城王元勰馆客，勰居洛阳，悆船行必在大梁（时称浚仪）以西水道，由洛入河，未入汴水。此条史料不足证汴水通航情况。例三，《水经注·渠：沙水》载：“王隐《晋书地道记》云：城北有故沙，名之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运所由矣。”<sup>[15]300</sup>该渠为古鸿沟，又称蒗荡渠、沙水、蔡水，是沟通黄河、淮河的一片水系<sup>[15]303</sup>。城北指晋代陈县（今河南淮阳）城北，乃作者王隐家乡<sup>[23]</sup>，所记为西晋漕运，非北魏。北魏陈县上游一些支流已枯，不似晋代，如“鲁沟又南入涡，今无水也”<sup>[15]298</sup>、“沙水枝渎西南达洧，谓之甲庚沟，今无水”<sup>[15]299</sup>。引此条史料证北魏“今水流津通”者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以上三例都不能证明北魏汴、颍水运发达。

北魏确曾多次规划疏浚汴、蔡，但均未实施。先看北魏承接的二水状况，上溯东晋末，汴、蔡已难于通航。时刘裕北伐后秦，檀道济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此线为旱路），沈林子、刘遵考领水军出石门（今河南荥阳东北）自汴入河，王仲行在军前开钜野泽通往河口<sup>[11]3689</sup>。刘裕引水军发彭城（今江苏徐州），自淮、泗入清溯黄河西上<sup>[11]3701-3704</sup>。灭后秦后，义熙十三年（417）“十二月，庚子，裕发长安，自洛入河，开汴渠而归”<sup>[11]3714</sup>。行航汴水需随时疏浚。刘裕留朱超石守蒲坂，“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sup>[24]</sup>，系由河入济道。总之，北魏继承的汴、蔡已不能水运，这才组织规划疏浚。《魏书·李冲传》载：“高祖自邺还京，汎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

之。”<sup>[9]1185</sup>此后，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再拟修渠，《魏书·崔亮传》载：“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sup>[9]1477</sup>这一条与上一条对应，说明孝文帝因财力拮据未开工。《魏书》被称为“秽史”，而其不谨更甚。虽云“公私赖焉”，但由于两淮战事紧急，宣武帝仍未施工，证据在第三次的讨论规划中。北魏末，第三次发起疏浚水运提议，薛钦、朱元旭、崔休、元雍与李崇等为主议者。时崔休为尚书，高阳王元雍录尚书，朱元旭为尚书房度支郎中。崔休是在孝明帝肃宗时始任尚书的<sup>[9]1526</sup>；元雍在孝明帝母胡太后柄政时录尚书，孝明帝问政初仍之<sup>[9]556</sup>；朱元旭在孝明帝时任尚书房度支郎中<sup>[9]1624-1625</sup>。由此确定提议时间为孝明帝揽政之始的正光元年（520）下半年<sup>[9]229</sup>，距朱荣发动河阴之变的武泰元年（528）只有八年，距北魏灭亡（534）只有十余年了。时薛钦主张恢复汾渭、黄河中游局部河段水运，崔休将规划升级到全国范围：“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昔忝东州，亲迳阙验，斯损益不可同年而语。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尤为不少。……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sup>[9]2860</sup>元雍、李崇积极支持：“‘若此请蒙遂，必须沟通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sup>[9]2860</sup>大臣讨论均为实情，说明整个北魏时期，一直沿用战国、魏晋兴修的华北、黄淮水运，年久失修，不得不水陆并济。孝明帝拾起整治全国水运的念头，但国运已衰，终未更改陆运主导地位。总之，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次规划疏通内河航运，其中前两次为河、淮间运渠，第三次涵盖全国水运，均未果。

以上所举黄河上游地区、华北、黄淮的航运，历北魏一代从未予大规模疏浚，多以中短程航运、津渡为主，需辅以陆运才能连贯，内河航运较汉晋严重倒退。那么，全国运输体系是依靠什么方式运行的呢？

## 二、以洛阳为中心的运输干线

### （一）汾渭至洛阳的车运

北魏末，薛钦主张恢复汾渭、黄河中游局部河段水运：“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sup>[9]2858</sup>以上七地，位于渭河下游流域的华州，治李润堡，今陕西澄城西南、蒲城东北<sup>[25]</sup>。位于黄河、吕梁山间的汾州，治蒲子城，

今山西隰县，为诸臣讨论时的州治；孝昌年间（525—527）迁西河郡，今山西隰城县<sup>[9]2483</sup>。位于汾河流域下游的平阳郡，治禽昌，今山西临汾；正平郡，治闻喜，今山西新绛。位于黄河转弯处的河东，治永济，今山西永济。位于黄河南岸的恒农郡，治北陕，今河南三门峡西。位于黄河北岸的河北郡，治大阳，今山西平陆西。恒农、河北夹河而置，为的是河中有砥柱之险，船只难以顺流而下，不得不从北岸摆渡到南岸陆行，《水经注·河水》载：“砥柱，山名也。……山在虢城东北、大阳城东也。”<sup>[15]53</sup>“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故有众峡诸滩之言。五户，滩名也……”<sup>[15]54</sup>以上州郡五个隶司州，其余两个也紧邻司州边缘，为国家腹里所在，用牛车往洛阳运送物资。薛钦（三门都将）建议从汾、渭下游入航黄河，到潘陂卸船装车送仓<sup>[9]2859</sup>（仓指洛阳太仓、租场）。潘陂据《洛阳伽蓝记》载：武泰元年（528）“四月十一日荣过河内，至高头驿。长乐王从雷陂北渡，赴荣军所”<sup>[26]</sup>。潘陂（雷陂）是洛口渚陂之一，已发育为南岸渡口。朱元旭等大臣都支持薛钦以舟代车，“今校薛钦之说……虽云以船代车，是其策之长者。……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执作……”<sup>[9]2859</sup>孝明帝初始莅政，欲有所作为，然而国势已衰，加上不久胡太后复辟，改漕运一事未尽行遂罢。以上学界常引史料，非但不能证明北魏航运的发达，反而透露了腹里陆运的旺盛。

### （二）洛阳至邺的陆运

太和十九年（495），“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道悦表谏曰：‘……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已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sup>[9]1400</sup>孝文帝最终改从陆行。石济关即黎阳津，北朝枋头所在，在今河南浚县西。它位于太行山、山东丘陵间东北向冲积扇的顶点附近，在此转弯的黄河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交汇，因而渡口密集。东汉末，曹操在浚县遏淇入白沟<sup>[27]</sup>，再合清水、漳水达邺城，更开凿以邺为中心覆盖华北的水运网，后渐废。北魏孝文帝迁洛时，漳、洹（白沟支流）已无水运<sup>[28]</sup>。辽东新昌（今辽宁海城）人高道悦祖上归北魏，父时居脩县（今河北景县南）<sup>[9]1399</sup>，道悦生长于东土，熟知华北与中原间水运荒废情况，故谏止孝文帝航行。永熙三年（534），高欢迁都于邺，“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sup>[28]</sup>。北魏向未大规模修浚漳水、白沟，末年华北水运未必胜前，水运由白沟通向洛阳只是个大概方向，仍需接以陆运。总

体上,北魏洛阳至邺以陆运为主。

### (三) 洛阳至碣礅的陆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黄河中游流域畜牧业比重大,土壤植被覆盖良好,黄河下游含沙量小<sup>[29]</sup>,丰水季水势浩大难航。孝文帝为此以身冒险,企图振兴河运,太和十九年(495),“帝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专主舟楫,将汎泗入河,泝流还洛。军次碣礅,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帝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人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此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诚至而不得相纳。’”<sup>[30]</sup>孝文帝从徐州沿泗、汶北上至茌平,皆往昔东晋、南朝宋常行水道,而河运相对荒凉,孝文帝为之煎熬,同年,他在《祭河文》中憧憬未来“千舳桓桓,万艘斌斌”<sup>[31]</sup>场景,与“人皆难涉”现状有天壤之别,洛阳到今山东陆运为主的状况北魏未能改变。

以上所举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三条陆运干线,辐射到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与山东平原经济腹地,以畅通发达的运输网支撑了北魏社会生活的运行与版图的稳定。

## 三、结语

北魏在与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在巩固与扩大北方统一的需要下,偏重于畜牧业与陆运,农业腹地如华北、黄淮罕见水利工程的兴修<sup>[32]</sup>,致使内河航运格局延续前代之残迹而已。北魏内河航运的分布格局零散而效率低下,且指向两淮而非都城。而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陆运网络发达畅通,构筑了北魏统一的、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

### 注释:

①本文所录北魏州郡古今地名参见《魏书》卷106《地域志》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南北朝卷》。

### 参考文献:

- [1] 刘汉东. 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J]. 许昌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3): 53-56.
- [2] 何德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2): 150-157.
- [3] 薛瑞泽. 北魏的内河航运 [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28-32.
- [4] 马晓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 59-63.
- [5] 张兴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淮地区水上交通的拓展与利用 [J]. 许昌学院学报, 2005(4): 28-31.
- [6] 张兴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的水运与仓储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 2006(36): 12535-12536.
- [7] 张兴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平原内河航运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114-118.
- [8] 张兴兆. 魏晋朝南北朝时期的黄河航运 [J]. 许昌学院学报, 2008(3): 17-22.
- [9] 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 任重, 诸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邸阁 [J]. 兰台世界, 2006(20): 54-55.
-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2] 王子今. 秦汉黄河津渡考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9(3): 127-134.
- [13] 张兴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津渡考 [J]. 运城学院学报, 2008(1): 11-16.
- [14] 王万盈. 北朝仓库系统探研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5(1): 20-26.
- [15] 郦道元. 水经注 [M]. 陈桥驿, 注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 [16] 程延恒, 等. 大名县志 [M]. 洪家禄, 等纂.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年影印本: 136.
- [17] 《大名县志》编撰委员会. 大名县志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4.
- [18] 白晓燕, 任雪岩. 河北大名府故城宫殿遗址调查 [J]. 文物春秋, 2015(5): 27-34.
- [19] 李林奎, 王自尊. 元氏县志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年影印本.
- [20] 伊承熙, 等. 宁晋县志 [M]. 张震科, 等纂.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9 年影印本: 122, 124-128.
- [21] 刘洪山, 张和鹏. 煊赫一时的碣礅城 [N]. 聊城日报, 2009-06-15(A04).
- [22] 史念海. 论济水与鸿沟(下)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10): 85-97.
- [23]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142.
- [24] 沈约. 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426.
- [25] 马长寿.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2, 46.
- [26]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 [M]. 周祖謨, 校釋.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7.
- [27] 周媛. 河流主导的浚县古代城市发展 [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1: 24-25, 31, 34.
- [28] 李百药. 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6.
- [29] 谭其骧.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J]. 学术月刊, 1962(2): 23-35.
- [30] 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00.
- [31] 元弘. 后魏孝文帝祭河文 [M] // 徐坚, 等. 初学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23.
- [32] 王元林. 变害为利, 泽惠社会——《水经注》记载的治水与水利社会图卷 [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15-17.

[责任编辑 文 川]